■教育时评

文·伍宸

“名校旅游热”可以化负担为机遇

每年暑假，与天气一样酷热的还有国内各大名校的校园，特别是诸如北大、清华等顶级名校的校园更是门庭如市，络绎不绝的游客占领了校园几乎每个角落，以至于一些高校不得不采取限流等措施控制游客入校数量。从名校游客成分分析看，大多是中小学生及其陪伴的家长。

名校成为假期中小学生热捧的景点，首先体现了这些学校对广大中小学生超强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正向激励作用，事实上每个学生心中都有个北大清华梦。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过分追捧名校也是应试教育背景下家长学生的应激反映，不少商家也抓住这样的心理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以此牟利。这种热潮也给一些名校带来了幸福的烦恼，过多人员涌入给其正常教学工作带来影响的事实不容否定。但在此背景下谈什么让家长学生理性看待名校并不现实，各大名校要借此机会不断提高学校的公共服务意识与能力，转负担为机遇。

在大学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推器的今天，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增强大学自主发展意识与能力已成为广泛共识。我国高校，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名校更需要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增强公共服务意识与能力，以此获得学校发展的资源。这其中包括：充足的生源基础、广泛的社会美誉度、良好的社会形象等。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开发对于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借名校旅游热之机，让学校成为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形象的平台。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流生源的竞争，各名牌大学充分利用受广大中小学生及家长“追捧”的机会，让学校成为对外宣传最直接、最有效的平台。具体来说，名牌高校可以在暑期开展对中小学生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具体内容包括：学校办学优势与特色、开设专业、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等，让这些中小学生不仅对名校有直观的了解，还有更深入和全方位的理性认识。名牌高校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热情、主动地为到访游客服务，能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拉近学校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与此同时，名牌大学还是一国或地区科教和文化中心，可有针对性地在暑期积极组织面向广大中小学生和普通民众的科技知识及人文教育。

此外，借名校旅游热之机，让学校成为大众爱国主义教育中心。名牌大学不仅具有高水平的教学科研水平，同时还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历次大的历史转折中我们均能看到名牌大学的身影，诸如“五四运动”中的北大、“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大、北师大等。同时不少革命先烈也曾经在这些名牌大学学习、工作过，诸如毛泽东就曾经在北大工作过，鲁迅也在北大、北师大等学校教书育人。其中，北京大学就诞生于上世纪初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中，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传播真理、开化民风、培养救国救民精英人才的使命。事实上，以北大代表的一批名牌大学之所以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就是因为时刻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些正是当前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素材，让中小学生从名牌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得知：今天的美好生活是经过无数中国精英数十载不懈奋斗的结果，来之不易需倍加珍惜，而其中名牌大学起了重要作用；知识不仅可以改变个人命运，还可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要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不能让名校暑期游仅仅成为中小学生走马观花、猎奇的场所，需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充分发挥名牌大学自身的优势成为宣传自身与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平台，成为科技人文教育的中心，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心。

“事实孤儿”谁来管？

文·李金红

他们本应度过最无忧的年华，却因父母重度残疾、服刑、患严重疾病等因素而无人抚养。他们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孤儿，但事实上，却孤苦无依。他们未被纳入孤儿救助体系，但与孤儿相比，他们面临着同样、甚至更加严峻的生存难题……

这是“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缺乏关注、亟待救助的边缘群体。

生活困境：幼小兄妹“一顿粥管一天”

56岁的王安崇小心翼翼地将一小勺白米粥喂给面黄肌瘦的孙子王朝泉。客厅右侧，刚过百岁的老父亲也端着一小碗粥慢慢喝起来。

这是一个苦命的家庭。2014年10月，海南省屯昌县南坤镇山塘村委会南安村村民王安崇的儿子患癌症离世，年底，儿媳在产下女儿不久即离家出走。如今，孙子王朝泉不到两岁，孙女王颖才八个月。

昏暗的卧室里，简陋的木板床上只有一张凉席，床边放着一个草垫防止孩子翻身摔下。王安崇说，因为没有钱买纸尿裤，加上有时来不及照顾，孩子经常把床弄脏。

“我买不起奶粉，只能给他们熬粥，一顿粥要管一天。”王安崇告诉记者，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和老父亲，他没有时间外出挣钱，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去年村里给办的低保每月600元，因为孙子孙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享受不到孤儿救助。

相比王朝泉、王颖兄妹的生存问题，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宫花村12岁的谢国器则承担了一家之重。父亲因病死亡，母亲精神残疾，哥哥智障，这个12岁的男孩一直靠拾荒维持整个家庭。

王朝泉、王颖兄妹和谢国器，是“事实孤儿”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尚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未成年群体——他们因父母重度残疾、父母服刑，或受艾滋病等因素影响，导致事实上无人抚养。近年来，诸如“四川猪圈女童”“贵州毕节儿童自杀事件”等，让“事实孤儿”群体的生活困境走进公众视野。

“事实孤儿”到底有多少？据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中心课题组根据全国20个省份的数据推算，截至2011年，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总数可能在57万左右。

有关专家认为，由于长期缺乏社会关注，潜在的“事实孤儿”数量，或许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字。

精神困境：“曾经有‘事实孤儿’几次试图自杀”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从2014年陆续在陕西、广西、甘肃和海南展开“事实孤儿”生存状况摸底调研，并开展针对性的救助项目。

项目在对陕西地区5至14岁之间的237个“事实孤儿”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因父亲死亡或身患重病，母亲改嫁或离家出走的行为而造成“事实孤儿”的比例接近50%。

在海南“事实孤儿”一项调研中，178名孩子中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占78.29%，月收入500元以下占66%，有九成家庭月收入1000元以下。

“相对生活的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项目负责人甘峻表示，志愿者在对海南、甘肃、广西、陕西等省份“事实孤儿”摸底调查时发现，当被问及父母情况时，绝大多数孩子都避而不语，情绪低落。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孙磊对此深有体会。他与西北大学组成调研团队展开调查，设计发放的问卷涉及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在校学习、社会支持等60个问题，并和120名“事实孤儿”进行了深度访谈。

调研报告显示，约有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只有35.1%的孩子心情不好会向家人倾诉；多数孩子不善言谈，存在明显的自卑倾向；32.4%的孩子经常或偶尔觉得活着没意思。

甘峻的团队在走访中发现，半数以上的“事实孤儿”不时感觉恐惧，甚至有人产生轻生念头。“曾经有‘事实孤儿’几次试图自杀，媒体报道后才得以救助。”

救助困境：“到底哪个部门管，我们也不清楚”

目前，“事实孤儿”的帮扶救助工作存在很多困难。记者了解到，“事实孤儿”未被纳入孤儿救助体系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难点尚未解决。

——缺依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王永强介绍，由于法律层面对“孤儿”定义的内涵过窄，导致“事实孤儿”游走在法律保护和政府救助的边缘地带，成为亟需救助的特殊群体。

民政等部门在救助“事实孤儿”时感到有心无力，甚至有地方民政部门被审计、财政等监督部门警示，这样做涉嫌挪用孤儿专项福利金，“因为‘事实孤儿’不是孤儿。”

——缺政策。海南民政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从全国来看，“事实孤儿”的救助没有统一政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事实孤儿”可能得到救助，但偏远地区的救助几乎是空白。

某省儿童福利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有时候发现一些困境家庭的“事实孤儿”无人抚养，“我们想接收过来，但是上面没有相应的政策，只能作罢。”

——缺制度保障。“到底哪个部门管，我们也不清楚。”海南省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针对“事实孤儿”这个群体的帮扶救助，并没有明确的部门职能划分。甘峻说，在基金会项目曾走访的一些省份，“我们想帮这些孩子，但是找不到一个统一的部门来对接。”

中国儿童中心主任丛中笑告诉记者，“事实孤儿”帮扶涉及到生活、教育、心理等方方面面，许多部门都在参与，但缺乏完善的机制，因此尚未形成合力。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事实孤儿”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及社会力量的关注。民政部此前公开表示，在对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将积极争取将事实上无人照顾的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在一些省市，发放生活津贴的困境儿童已拓展到父母双方失踪、服刑、重度残疾的未成年人。

甘峻认为，应尽快建立“事实孤儿”动态档案并进行持续性的救助试点工作，实施动态管理。“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孤’有所养的问题，还需将‘事实孤儿’纳入国家制度性救助体系，而非短时、临时性的政策。”

丛中笑建议，从制度设计上完善对这些孩子的救助，“由某一部门牵头形成联动机制，从信息采集、鉴定、审核到分类救助等方面，形成规范化的流程便于执行操作。此外，还应探索多元化的福利供给机制，尽快推动儿童福利法出台，使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尽早实现全覆盖。”

■图片新闻

7月28日，王贵恒在“青少年教育工作室”与孩子们下象棋。

河北东光县连镇皂户陈村75岁的王贵恒是一名退休教师。从2012年10月开始，了解到村里一些孩子在假期疏于管理，存在教育空白后，王贵恒将家中仅有的三间房腾出两间，办起“青少年教育工作室”，对村里的孩子、留守儿童进行课外教育。 新华社发（傅新春摄）

■教育快讯

教育部：5年内建成300个具有示范引领作用骨干职业教育集团

教育部网站23日消息，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职业院校集团化办学参与率进一步提高，规模以上企业参与集团化办学达到一定比例，初步建成300个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骨干职业教育集团，建设一批中央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的职业教育集团，基本形成教育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局面。

据了解，意见的出台是为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和市场引导作用，本着加入自愿、退出自由、育人为本、依法办学的原则，鼓励国内外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参加职业教育集团。

意见要求，要健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运行机制。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利益链”为纽带，促进校企双赢发展。强化校校合作、贯通培养，系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广泛开展职业培训，建设人才成长“立交桥”。强化区域合作、城乡一体，支持优质职业教育集团开展跨区域服务，促进区域间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探索集团内部产权制度改革和利益共享机制建设，开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试点。

意见强调，对职业教育集团开展体制机制改革、招生招工一体化、培养模式创新等探索实践，优先给予政策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支持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共享型实训基地、教学资源、教学团队、信息平台，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研发中心，提高集团内涵发展和社会服务能力。

据悉，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已组建职业教育集团1048个，成员单位4.6万个。

第九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召开

科技日报讯（张伟）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和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许昌学院承办的第九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于7月25日至29日在许昌召开。来自基金委和全国30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重点围绕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各个方向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会上，天津大学王树新教授、上海大学陈立群教授、清华大学宝音贺西教授、解放军理工大学王在华教授、中国科学院吕金虎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张伟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青云教授分别作了“水下自主航行器系统设计与动力学行为的研究”“内共振振动能量采集”“小天体探测动力学与控制”“轮式倒立摆的时滞反馈控制”“大数据：网络科学的机遇与挑战”“动力学与控制学科发展与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些思考”“从可计算模型理解癫痫发作的动力学机制”7个大会报告。会议还邀请了30余位包括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获得者、国家青年千人获得者作了相关学术报告，会议的召开促进了动力学与控制学科的交流和发展，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的平台。

“中学生领导力培养”课程实践成果在京集中展示

历经5年的探索与成长，截至2015年6月，“中学生领导力培养”课程已在全国26个省份的300多所重点中学展开。正在此间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集中展示了2014年“中学生领导力培养”课程实践活动成果，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风吹麦秸”等15个项目被评为优秀项目。

在展示会现场，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风吹麦秸”项目队，展示了发生在2012年广饶县东秦村火灾现场的一幕。“秸秆焚烧引发了这场火灾，同时致使空气污染、土壤酸化。”陈佳乐同学在展演中介绍，为改变这一现状，小组成员们通过问卷调查、走访气象局、项目实验等方式，最终帮助当地学校食堂和村落接受秸秆制品并制造13个沼气池；身着川戏戏服的重庆市江津中学“拾梦川腔”领导力实践团队，以开场演唱传统的川剧选段的情节，呼吁更多人来保护传承这项文化遗产……新颖的表现形式、严谨的项目实施过程以及现场展示清晰的条理给观众和评委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届展示会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共吸引国内外150所学校、千余名师生代表及志愿者参加。展示会以“引领学生新风尚、共享项目新体验、开启公益新主张”为主题，设置有“改进公共政策、组织帮扶弱势群体活动，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等8类展示项目。

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大赛组委会秘书长王陆军介绍说，作为“中学生领导力培养”课程的延伸部分，本届除了三轮项目现场展示外，还将通过跨学校、跨区域、跨文化的学习、交流与合作，及专家讲座、全球青年公益创新论坛等多类活动，考察和培养当代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组织管理能力。通过做项目中的尝试和实践，学生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第二看台

保险！保险！校园足球的软肋

放眼国内校园，一方面是中小学生体质水平、健康状况堪忧，需要参加锻炼；另一方面因校园运动意外伤害而引起的纠纷使校方刻意回避有风险的运动项目，陷入了恶性循环。可以说，如果不破解学生因踢球受伤而给家长和校长造成的后顾之忧，如果不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校园足球保险制度，那么校园足球将举步维艰。

校方责任险有待完善

目前中小学里使用较多的险种是2008年推出的校方责任险，对校园足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它的弊病也显而易见。

校方责任险顾名思义就是校方有责任，这是保险公司兑现赔付的前提，但很多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并不是校方的责任。要动用这个险种，就意味着默认了校方的责任。对此，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坦言，一些情况下，保险公司赔钱了，家长还是会跟学校过不去。“因为你学校有责任，我拿到的钱是保险公司赔的，那你该承担的责任部分你怎么赔？所以校长非常不愿意用校方责任险”。

附加险推广势在必行

于是，一些地方开始推行同样由政府出资购买的校方责任险附加险，即校方无过失责任险。

据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人员王迪介绍，北京市教委已为北京的中小学投保无过失责任险，和校方责任险一样是每人每年5元的标准，覆盖了所有公办学校和大约80%的民办学校，有效地应对了学生在校参加体育锻炼遇到的意外伤害风险。据王迪介绍，有类似保险的城市不止北京一个。

尽管王迪认为，校方责任险与附加的无过失责任险“双管齐下”，对在校生已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他同时提醒，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足球培训机构出现，而这些机构大多是民办，并不在政府出钱买保险的涵盖范围内，有潜在的风险。

针对这一情况，青岛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李沧区教体局、城阳区教体局（甲方）与青岛中能俱乐部、青岛中能青少年足球推广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约，要求乙方承担的所有培训都必须有安全措施，同时负责为参与足球业余训练的甲方校队球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此外，李沧区还与一家保险公司合作，把所有学校的场地通过政府招投标的形式保了场地运动险。只要是来这些学校场地踢球发生意外伤害的人员，无论是学生还是其他人，保险公司要支付一定的赔偿费用。一个场地一年的保费大约3000多元，全区的保费总额是20至30万元。

王登峰表示，他们更希望促成一个学生体育运动伤害险。湖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杨跃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应该在校方责任险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学生体育运动意外伤害险。国家层面需要有顶层设计，统筹兼顾，把足球等学生开展的运动项目纳入体育运动伤害险，以完善整个学校体育的保险机制。”

第三方调解机制不可或缺

现在中国有很大比例的独生子女，一旦因踢球等运动受伤，学校将面对家长追责、业绩考核一票否决等麻烦，赔偿不满意有些家长还要打官司、上访。重庆七中校长邓宏曾举例说，一次校队外出比赛时，一名学生因为冲撞而导致肾脏破裂，尽管购买了保险，但学校仍然花了很长时间才处理好此事。因此，应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明确学校、家长各自的安全责任。同时，在完善学生体育运动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的基础上，一个负责调解家长与学校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不可或缺。

王登峰表示，有了学生运动意外伤害险，不管在家还是在哪儿，只要学生踢球受了伤，不管谁的责任你都得给予赔偿，而不能让家长和校长对着干，不能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得有一个调解的机制。这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

据了解，宁波已经借鉴医疗纠纷的第三方处置机制，根据人民调解的有关法律规定，设立学生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学生意外伤害纠纷的调解工作。各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司法局的下属机构，主要由律师和调解员两类人构成。这些成员通过与教育部门协作配合，开展调解。天真烂漫的岁月，奔跑雀跃的时光，激烈对抗的球场，谁还能不受点伤！只要认真杜绝各种安全隐患，健全校园足球意外伤害保险制度，无论学校还是家长，都不应该以安全为理由剥夺孩子们踢球的权利，扼杀学生们踢球的天性。 （据新华社）